

第一章 东南沿海城市与 中国近代化

一、近代上海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点

上海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是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同步发展的。上海城市历史并不悠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它并不是在传统城市基础上自然长成的，而主要是在近代崛起的。上海在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历史上，远不能比西安、开封、洛阳，近不能比苏州、杭州，甚至比不上今天属于上海市范围内的松江。1843 年开埠以前，中国超过 3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为北京、苏州、广州、杭州、成都等。那时的上海还只能算是中等城市。

开埠以前，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地位，与城市地位相当。那时，上海人口二十多万，虽然沙船航运业已得到发展，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力也有提高，上海商业也已出现万商云集、百货荟萃的兴旺景象，虽然上海也有一些文化设施，如书院，出过一些文化名人，如徐光启，产生过一些有文化意义的工艺品，如顾绣，但就整个城市而言，上海并无明显的经济和文化个性。以经济氛围而言，上海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后来成为江南繁华城镇之一，以文化氛围而言，上海在古时属吴越文化圈，后来笼罩在苏扬文化中，都显不出上海个性。

上海在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崛起，主要是开埠以后的事。我们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中曾对上海城市的特点作过研

• 本文的文化发展部分得到熊月之研究员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究，试图找出近代上海城市的个性。下面就近代上海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特点，谈一些看法。

（一）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特点

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特点何在呢？现在看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条：以外贸为先导，城市设施率先近代化，全国最大港口城市，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1. 以外贸为先导

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的发展。1843年开埠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值仅占全国总值不足十分之一。由于上海以及附近地区的巨大商品消纳量以及上海紧靠丝、茶产区，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值就已发展到全国的50%左右。例如从茶叶这项当时主要出口商品来看，1851年从广州出口的茶叶仍有62 468 000磅，而从上海出口的尚仅36 723 000磅；到1852年则已转为广州36 127 000磅，上海57 675 000磅。

随着长江一些口岸先后对外开放和中国轮船招商局、太古轮船公司及怡和轮船公司等中外轮运企业兴起，上海在全国埠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上海集散的商品已不仅依靠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依赖于整个长江流域商品市场的发达。正是上海在埠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逐步促进了近代上海进出口贸易总汇地位的确立。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进出口的商品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以进口商品而言，从70年代初的90多种增加到20世纪以后的1 000多种；以出口商品而言，除少数接近产地的城市有直接出口外，大部分出口产品都不同程度地要运往上海出口。上海的优势地理位置，加上长江水道的便利水运条件，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

面的结合部。上海这种既处在黄金海岸的中点，又处在黄金水道长江之口，有整个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巨大腹地的自然地理优势，可说是得天独厚、举世无双的。开放度的加强，使上海的潜力不断得到发挥。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对外贸易总值增加了11倍，年贸易值占全国比重最高达65%，最低也在44%。

近代上海外贸的发展使上海日益与国际接轨，扩大了上海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1945年时，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行多达2100家，其中洋行400多家，私人商行1600多家。据上海1950年时较全面准确的资产估算，19个直接从事外贸以及和外贸密切有关行业的商业户占全部资产重估户的35.8%，但它们的资产值要占全部资产重估户的60.3%。外贸在近代上海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贯穿始终。它带动了对内贸易及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交通、运输、电讯业的发展，金融业也随之兴旺起来，近代工业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就是说，它使近代上海经济各个部门产生了连锁变化，大大地推进了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2. 城市设施率先近代化

我们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中指出，由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带动，上海城市设施的近代化起步堪称全国第一。开埠前，上海旧城区虽已相当繁荣，但道路狭窄，大多为泥土路，只有部分砖石路。1845年的《土地章程》首先把路政订入了有关条款，规划了南北干道3条，东西干道7条，以适应城市近代化的要求。一个不同于旧城镇街巷的新区由此而兴。沿黄浦江的昔日泥滩纤道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拓宽至15.27米，路边广植树木，最早来沪的洋行纷纷在路边起造楼宇。开埠后新修筑的道路逐步改成碎石路、煤渣路，后来一些主要道路修成了沥青路、混泥土路，马路两侧铺设阴沟，解决了路面积水问题，大大方便了市内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市内新的道路系统的形成，使城市

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南京路、霞飞路(淮海中路)成为名闻中外的商业街,为近代上海跻身于世界近代大都市的行列创造了条件。

近代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和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公用事业大发展。公用事业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也是良好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近代上海最早的公用事业是上海煤气股份公司,于1862年11月1日正式供气,这是中国第一家煤气公司。中国最早的电力厂是1882年在上海正式开始供电的。1881年上海自来水公司宣告成立,1883年开始供水。代表现代物质文明的电话、电报也在1881年开始,由大北电报公司兼营电话、电报服务。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较迟,到1905年才成立上海电车公司,1908年开始行驶有轨电车,1914年开始行驶无轨电车,1922年开始有公共汽车。总的来说,近代上海的公用事业开创早于国内其他城市、水平高于国内其他城市,使上海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国内外资金向上海汇集,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当然,由于近代上海租界与华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政治上的分割,导致公用事业经营的各自为政,造成的混乱使今天上海城市建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我们说,尽管近代上海城市建设在全国城市近代化方面处于先行和领先地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3. 全国最大港口城市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上海被誉为东方明珠,它是伴随着近代化的航运业的不断拓展而迅速发展的;远洋、沿海及长江航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港口航道、港岸设施的近代化,构成了上海大交通近代化的主体。上海以内河和长江、沿海航运为基础的优越水运条件在近代以前已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同欧洲、美洲、澳洲

以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相继开辟。上海对内对外贸易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是与航线的开辟和上海近代化港岸迅速拓展密切相联的。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上海港口的进口净吨数已跻身于世界十四大港口之列。到 1930 年时,上海港口进出口船只达 23 739 艘,占全国的七分之一,总吨位数达 37 110 641 吨,占全国的 1/4,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现在着重分析一下近代上海港岸设施发展的情况和影响。近代上海港岸设施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奠基时期、拓展时期、增密时期、停滞时期四个阶段。从开埠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为奠基时期。最初进入上海的怡和、仁记、宝顺等洋行先后在黄浦江设置了商用码头。1865 年外商在虹口设立了近代上海第一个外轮专用码头,在浦东设置了第一个专业码头仓栈,江南制造局则买下虹口美商旗记铁厂,设立了宏特码头。于是主要码头仓库集中于北起虹口,南到法租界与上海县城交界之处形成一弯新月形的黄浦滩头。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为拓展时期。内外贸易迅速发展是港口拓展的首要动力,而 1895 年后近代化工厂的崛起是拓展的又一重要动力。近代港岸沿着黄浦江两岸突破租界拓展至江南船坞口,向北拓展至东沟,尤其是随着苏州河沿岸工业的发展,苏州河沿岸码头、仓库业也迅速发展了。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1937 年为增密时期。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码头、仓栈发展有进无止,港岸设施密度大大增加。1937 年到 1949 年为停滞时期,经过八年抗战,破坏惨重。

近代上海港岸设施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概括来说,奠基时期沿港岸而建的码头、仓栈为近代上海内外贸易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拓展时期港岸设施沿浦江西岸向南北延伸以及缘苏州河两岸的西进,对近代上海发展,特别是杨浦、闸北、沪西、沪南工业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增密时

期港岸设施的过度密集已开始显示消极的、破坏的作用,对城市交通、环境、居民生活设施健全发展都构成了沉重负担,也是今天上海城市发展中诸多严重问题的病源。

总的来说,近代上海航运业的发展以及港口航道、港岸设施的近代化促成了上海作为最大港口城市的地位,这是近代上海经济发展中又一不容忽视的特点。

4. 多功能经济中心

近代上海由外贸为先导,以城市设施先行,带动了各种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兴旺和交通运输的兴起,第二产业中各种近代工业企业也在上海产生了。

内外贸易和商业的发展首先产生了资金融通的需要,1847年第一外资银行英商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代理处。随后各国银行纷至沓来,影响最大的英商汇丰银行在1865年也来到了上海。从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就形成了由汇丰银行居统治地位的上海金融体制。1897年我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到1927年一段时间,是上海华资银行发展的高潮时期。它们之中不少是既具西方银行优点,又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银行,其综合实力已居外资银行之上。20年代、30年代初,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金融网已形成,上海已成为全国重要金融机构首脑机关的集中地,于是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上海在20世纪初就形成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线。1909年4月沪宁铁路建成通车,1909年沪杭铁路全线通车和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上海更有联结内地的铁路干道。1919年第一条近郊公路军工路的建成又揭开了近代上海公路史的序幕,并在30年代进入开辟省际公路的时期;这些公路的建成对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1922年上海修建龙华机场,1928年又修建虹桥机场,到

1929年后先后开辟了联结同内地各大埠的航空路线。上海在20年代末、30年代终于跨入了水、陆、空立体交通的时代。

近代上海工业最早是由外国人开始投资的，开始时集中在为外资服务的船舶修造业。19世纪60年代至1894年是上海本国资本近代工业的发轫期。在此期间开设了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等几家规模较大的官办工业企业。私人民族资本工厂也开始出现，但多为小型。1895—1913年为上海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时期。1914—1937年则为上海民族工业较大幅度增长时期。1933年上海30人以上工厂已达3485家，占全国12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总值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净产值72773万元，占全国12大城市总净产值的66%。近代上海确立了其全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纺工业的统治地位。

由于工商、金融企业的集中，交通电讯事业的发达，上海成为万商云集之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市场的信息在上海传递和交流。不少内地企业乃至外国企业都在上海设有机构以了解商情。难怪人们赋予了近代上海形形色色的美称：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窗口；中国的钥匙；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等。近代上海这种多功能经济中心地位，对其他中国沿海城市以及长江流域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特点

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特点何在呢？《近代城市研究》也作了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四条：鲜明的近代性，典型的都市性，全国文化中心，独特性——海派文化。

1. 鲜明的近代性

上海文化的近代性，首先表现在输入西学早而多。整个近

代,从 1840 年到 1949 年,西学输入中国,多半通过上海。以晚清为例,戊戌变法以前,中国输入西学的主要机构,除京师同文馆和博济医局外,其余都是先后在上海设立的,包括墨海书馆(1843)、美华书馆(1860)、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格致汇编社(1876)、益智书会(1877)、广学会(1887)等等。从数量上看,1843 年到 1898 年期间,全国共出版各种西书 561 种,其中 434 种由上海出版,占 77.4%。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诸如:伟烈亚力、李善兰继明末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又续译了该书后 9 卷,使这部古希腊名著得以完整地传入中国;艾约瑟、李善兰所译《重学》,将牛顿力学三大定律首次介绍进中国;傅兰雅、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首创了一套化学元素中文命名的原则;伟烈亚力、李善兰所译《谈天》,将西方天文学知识首次较为系统地介绍进中国;玛高温、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译》,首次具体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傅兰雅、应祖锡合译的《佐治刍言》,被维新派誉为“言政治最佳之书”;李提摩太、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则被誉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最佳著作等。戊戌变法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西学主要通过日本转口输入中国,中国和留日学生中共有 95 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 56 家设在上海,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会文学社等。清末所用新式教科书,绝大多数也由上海出版。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也都是上海出版的。

上海文化的近代性,还表现在新式文化事业起步早,数量多,影响大。从徐汇公学(1849)、格致书院(1876)、圣约翰书院(1879)、南洋公学(1897)到复旦公学(1905);从《北华捷报》(1850)、《六合丛谈》(1857)、《申报》(1872)、《万国公报》(1874)、《格致汇编》(1876)到《新青年》(1916);从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

翻译馆、广学会、商务印书馆到中华书局；从《点石斋画报》(1884)、《飞影阁画报》(1890)到新剧、电影，这些学校、报刊、出版机构、艺术机构，种种体现近代文化精神的机构，往往发轫于上海，集中于上海。一部上海近代电影史，几乎就是近代中国电影史。

上海文化的近代性，更表现于上海在意识形态方面率先拉开批判传统的帷幕，紧紧追踪世界前进的步伐。当其他地方还处于重义轻利价值观念，君为臣纲政治观念，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伦理观念绝对统治的时候，上海已开始怀疑重义轻利观念，批判重农抑商观念，批判君尊臣卑、男尊女卑观念，讽刺中华中心主义。在近代中国，冲击传统的浪潮，往往是从上海涌起的。当内地士绅还在耻于与洋人交接，视学西学为崇洋忘祖之时，上海已竞相将子弟送入洋学堂。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开办以后，一度为是否能招收科举正途人员，在士大夫中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校学生也是人在课堂，心在科举，不读外文，只钻八股。差不多同时开办的上海广方言馆，情况却大不一样，不但有科举正途的人来就读，而且学生学习外语的热情极高。晚清有9个出使大臣出身于京师大学堂或上海广方言馆，其中8人出自上海。此外，不辍足会总部设在上海，国人自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塾)首先出现在上海，艺术模特儿首先出现在上海，文明婚礼首先出现在上海。这些，都是上海率先跨出传统、进入近代的表现。

2. 典型的都市性

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文化带有典型的都市特点。戏园、茶楼、书肆、报馆，鳞次栉比，各有千秋；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游泳馆，名目繁多，应有尽有；这是城市文化的外观。讽刺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宫闱小说、历史演义，蔚为大观，持续盛行；京剧、新剧、沪剧、越剧、马戏、杂耍，争奇斗艳，各显风采；这是城市文化

繁荣的标志。至于烟馆遍于大街小巷,妓院之多甚于米铺,则是这个城市市民文化的病态反映。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缩小了人际空间距离,但拉大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市民不像乡民那样,既是邻居,又是劳动同行,有的还是亲戚,彼此相识相知。市民繁忙、快节奏的劳动,冷漠、疏离了人际关系,这一特点,使他们与以消闲、娱乐为目的的大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传播名人轶事,议论影剧明星,选举市花市树,选举城市小姐等等,这些属于市民公众生活的内容,在近代上海长盛不衰。这些也体现了文化的城市特点。文化事业发展齐全,网点集中,以至形成了著名的福州路文化街;文化名人荟萃,与国际、国内文化联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

上海文化的城市性,还表现在异质文化的高度相容性方面。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1945年以前,其人口的80%以上来自外地和外国。外国侨民最多时达15万人,来自英、法、美、日等近四十个国家,外地人则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东等十几个省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到上海,使上海文化带有很高的异质性。江苏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安徽人、山东人共处一隅,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同住一城,广帮菜、淮扬菜、川湘菜、北方菜,同样兴旺,这有利于异质文化的交流,养成了上海文化汇集百家、高度相容的特点。

3. 全国文化中心

上海开埠以后,在全国的文化地位迅速上升。在戊戌变法以前,上海已成为全国传播西学的最大基地,成为拥有新式学校最多的城市,成为孕育、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地方,因此,在近代文化建设方面,全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上海相比。可以说,进入20世纪,上海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心,比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要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新型知识分子集结。上海在开埠以后二三十年中,已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已有约1200人,包括从事报刊业的约500人,从事新式教育的约200人,从事出版业的约100人,以及医生、工程师、科技人员等约400人。1898年戊戌政变后,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汇聚上海,如容闳在政变后逃出北京,来到上海,蔡元培在政变后,先到绍兴,然后转至上海。1900年北方战乱,又驱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逃入上海,如严复先前执教于北洋水师学堂,战乱发生后,即离京赴沪。天津北洋大学堂有相当一批学生,因战乱而南迁上海。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定后,由于对清廷的失望达于极点,又一批知识分子来到上海,邹容等人为其代表。据我们的估计,到1903年时,上海已汇集了3000多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后来在中国教育、新闻、出版、学术、艺术方面有所造诣的知识分子,很多在本世纪都在上海活动过,包括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吴稚晖、张继、于右任、马相伯、蒋维乔、马君武、张元济、马叙伦、吴趼人、刘鄂、罗振玉、陈独秀、苏曼殊、柳亚子等。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中过进士、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声望的人,也有像邹容这样刚从日本归来的青年学者。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

第二,文化事业机构高度集中。本世纪初,上海是中国输入西学的中心。全国绝大多数翻译、出版机构都在上海,翻译、出版西学书籍数量要占全国总数2/3以上。上海也是出版一般书籍的中心。在19世纪80~90年代,点石斋石印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等机构,已在中国文化典籍石印方面取得惊人发展,著名的有《康熙字典》、《聊斋志异》、《二十四史》、《全唐诗》等,印数动辄数十万册。接着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异军突起,编写各种词

典、读本，销路极广。报刊的出版，更是林林总总，精彩纷呈。据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总》，从1899年到1911年，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共165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达69种，占42%。这些期刊有综合性的，如《东方杂志》，也有各种专业的，很多还是属全国性的，如《外交报》等理应在京城出版，却在上海出版了。有些刊物则明显带有地方性，如《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理应在浙江、安徽出版，却也在上海出版了。这正是上海已担当起全国文化中心角色的标志之一。至于上海的各种学校、文艺团体、戏剧演出场所，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

近代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理人文因素，有西学影响因素，有工商发达、交通便捷、信息灵敏等因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租界的存在。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但是，租界的存在却使近代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租界的国中之国的特点，使其成为清政府、北洋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方，也使其成为比较安定的地方，这既为上海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也为上海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4. 独特性——海派文化

上海文化，不等于海派文化，但海派文化无疑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方面。我们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中，也有专章论述。对海派一词的理解，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分歧。狭义的海派，一般指京剧、绘画、文学等方面的上海流派，其源起于晚清绘画中的“海上画派”和京剧中的海派，后来内涵扩展、延伸，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所涉人事也不复限于上海一地。近几年学术界的讨论，多是广义上的海派。但广义是狭义的放大，海派风格毕竟源起于上海，也以上海为中心。对海派的特征，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1）开风气之先。海派之得名，以绘画而论，任

伯年等人的以盈利为目的画美女头，绘风俗图，与传统的山水人物花卉不相干；以京剧而论，周信芳等人演新剧，用新道具，搞机关布景，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2）灵活多样。海派文化反应快，变化多，花样新，是城市文化商业性、趋时性、多变性的表现。当然，凡事都有限度，走到极端，性质就会有所变化。开风气之先固然好，但一味赶时髦，就会流于多变无根。灵活多样固然能促进文化发展，但过度灵活多样，就会变成流质善变，反复无常，流于浅薄。

近年来，上海文化、学术界对海派讨论时，曾出现三种态度，其一是主张高扬“海派”旗帜，以海派作为上海文化的代称；其二是痛斥海派的流弊，认为海派一无是处；其三是分析海派中良性与恶性之别，对于海派中的有益成分，可以继承发扬，对其有害部分，则加以摒弃。我们倾向于第三种态度。

【作者：张仲礼，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二、开放优势的失落与重构

——近代广州发展的特征

广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从周夷王八年（公元前 862 年）的“楚庭郢”算起，广州建城已有 2 855 年的历史。在汉代，广州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被史家称为全国的九大都会之一。唐代，与广州直接通商的国家、地区有 20 多个，广州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口岸。宋代，与广州有直接通商关系的国家、地区有 30 多个。明代，政府在广州专门设立“怀远驿”，以招待远方来的客商贡使。清代，广州建立了公行贸易制度，并一度成为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由此可见，古代的广州与外部世界保持有广泛而持久的联系，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按照古代的标准，广州是名副其实的远东国际大都会。

但是，中国这个最具有开放通商历史传统与优势的城市，却没有依据原有的优势在近代新的开放格局中登上发展的新台阶，反而出现优势失落、地位下跌的局面，给近代广州城市发展罩上一层阴云。

广州开放优势失落的迹象首先表现为广州外贸地位的下落。1840—1856 年间，广州对英贸易额即显下滑趋势。1844 年，对英进出口总值下降 48.2%。^[1]1860—1864 年，因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广州外贸额下降 36.7%。^[2]1867—1885 年间，广州外贸额出现水平上下波动的徘徊局面，1867 年为 1 650 万两，1885 年为 1 620 万两，19 年的平均值为 1 675.7 万两。1886—1894 年出现一次小的增长高峰，增长了 45.2%。1895—1923 年，广州

外贸额由 4 946 万海关两增到 16 407 万海关两。28 年间增长了 2.3 倍。1924 年以后,广州的外贸额大幅下跌,1939 年跌至 926 海关两,仅为 1923 年贸易额的 5.6%,甚至只有 1895 年的 1/5。^[3]

近代广州外贸总额时增时减,波动较大,发展速度缓慢,因而在全国外贸总额所占比例不断下降。鸦片战争前,广州的外贸额为全国的 100%,1860 年已猛跌至 33.3%,1867 年跌至 14.2%,1911 年更跌至 10% 以下,1925 年跌至 5.1%,1939 年仅为 0.3%,40 年代在 2.3—7.6% 之间波动。1949 年因形势巨变,广州占国统区贸易总额的 21.4%。^[4]可见,广州长期保持的中国外贸中心的地位,到近代很快就失去了。19 世纪 50 年代中叶广州外贸开始落后于上海,五四时期落后于天津,还一度落在汉口、大连、青岛等口岸后面。广州正从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沦为二流的通商口岸,不仅不再是全国的贸易中心,而且由于香港的崛起,甚至不能说是华南的外贸中心了。

广州开放优势的失落还表现在它的开放度方面。在古代,广州曾是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开放度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商业口岸之一。唐宋之际大批阿拉伯和东南亚商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的蕃坊中,生意滔滔,乐不思蜀。明清之际,西方商人也对广州的贸易条件大加赞赏。一位在穗经商 10 余年的美国商人称:“在世界各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于外侨的安全比这里更加注意了。”^[5]1830 年,在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6]但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与其他一些新兴口岸相比较,广州的开放度显得相对萎缩。

首先,驻穗的外商机构在全国同类机构中所占的比重已大大减少。鸦片战争前,广州曾经是外商驻华机构的大本营。但鸦

片战争以后，驻广州的外国洋行纷纷将其总部转移到香港和上海，留下的只是二级或三级分行。在近代，广州的外国洋行机构发展相对缓慢，相比之下，上海等地的外商机构发展十分迅速。请看下表：^[7]

年 份	全 国	上 海	广 州	广州在全国位次	广州/全国	广州/上海
1891	547	280	47	3	1/11.6	1/5.9
1901	1 102	432	58	5	1/19	1/7.4
1911	2 863	643	102	7	1/28	1/6.3
1921	9 511	1 741	168	9	1/56.6	1/10.3

汉口的洋行 1921 年为 197 余家。^[8]天津的洋行 1911 年为 260 家，到抗战前已发展到 2 686 家。^[9]

与外商机构转移相适应的是，居留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人数也时增时减，并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1838 年，驻穗外侨有 307 人，1845 年减少到 250 人，1850 年为 362 人，1859 年为 172 人。^[10]而驻沪的外侨则由 1842 年的 25 人增加到 1859 年的 408 人。1841 年香港的外国人为 230 人，1854 年已达到 1 643 人。^[11]此后的情况请看下表：^[12]

年 份	全 国	上 海	广 州	广州在全国位次	广州/全国	广州/上海
1891	9 067	4 956	424	3	1/21.3	1/11.6
1901	19 119	8 296	577	8	1/33	1/14.3
1911	153 522	30 292	1 324	11	1/116	1/22.8
1921	240 769	31 893	1 647	14	1/146	1/19.3